

数字时代处处“要脸”，但千万不能“丢脸”

专家认为应从技术、立法、执法等方面着力，保护好数字时代的通行证

人脸、声纹、基因等“人体密码”是数字时代的通行证，一旦泄露，公民如同“裸奔”，后果不堪设想

生物识别信息保护如此重要，但目前“丢脸”“失声”现象不断出现

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使用场景愈发广泛，但是相关的应用还存在技术漏洞。与此同时，相关立法和监管机制还存在一定滞后

本报记者胡锐、戴威

出差归来，安徽合肥市民周进良被新装的门禁系统，挡在了小区门外。

录入人脸信息、对准摄像头、屏幕出现面部照片、大门开启……方便倒是方便，但他却有一丝担忧，“我的人脸信息是谁在保管？会不会有泄露的风险？”

周进良道出了一种普遍情绪：人们在享受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便利的同时，也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充满顾虑。

近年来，人脸识别、声纹识别、基因检测等生物特征识别技术，不断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同时，侵犯公民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。人脸、声纹、基因等“人体密码”一旦泄露，公民如同“裸奔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赏脸”不是自己说了算

“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。它具有唯一性，无法更换或删除，一旦被不法利用，可能给信息主体的人身、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带来危害。”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俊强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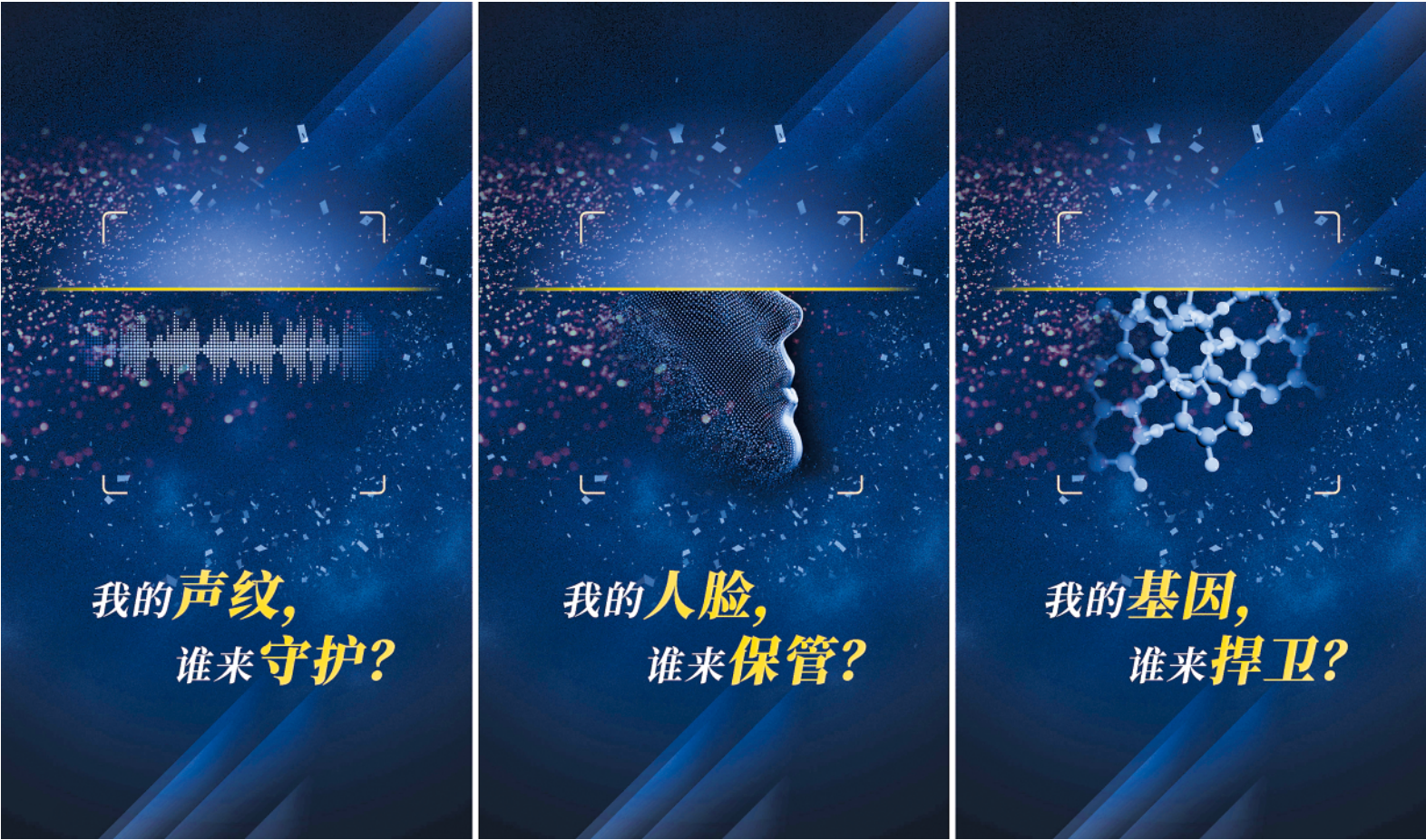
生物识别信息保护如此重要，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，目前信息采集和使用还存在诸多乱象，“丢脸”“失声”的现象不断出现。

生物识别信息被强制采集。乘车进站、上班打卡、转账支付甚至存包、取厕纸……日常生活中“要脸”的地方越来越多，而很多时候，我们无权决定是否“赏脸”。

今年4月，江苏部分社区推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，居民被要求录入人脸照片、家庭住址等信息，否则将无法正常进入小区，这让很多居民颇为无奈。有居民表示，人脸是自己的生物信息，怎能随意被人拿走，一旦泄露，造成的后果谁来承担？

类似的强制采集人脸信息的案例在多地都有发生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根本没有“讨价还价”的可能，即使心怀疑虑，也只能提交人脸信息。

生物识别信息被盗用。你的“面子”也很“值钱”。今年10月，湖北省巴东警方破获系列微信支



制图:刘旭峰、章舒

付诈骗案。办案民警介绍，不法分子在窃取受害者微信账号后，找出受害人的自拍照，并通过照片活化技术骗过微信支付的人脸识别验证，进而转移受害人的账户余额。

通过微信语音和你“热聊”的好友，很可能是骗子。南京警方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，2019年10月，南京市民陈先生收到一位“朋友”发来的语音消息，说要借5000元钱。陈先生听着是朋友的声音，没多想就把钱转了过去，谁知对方收到钱后不久就把他“拉黑”了。专家介绍，现有的AI语音合成技术可以从原始录音中取样，模拟出相似度极高的声音，极具欺骗性。

生物识别信息被泄露。对于公民来说，生物识别信息一经提交，这些“人体密码”将去向何方，不得而知。近年来，这类信息被泄露的案例屡有发生。

寄出一毫升唾液，就能测出自己的血统来源，是否为“易胖体质”，是哪些疾病的易感人群。听上去是不是很有吸引力？许多人都希望通过基因检测，拥有一本专属的“生命说明书”。

但个人基因信息，同样存在被泄露的风险。2018年10月，科技部官网公布了一批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国内外共六家机构上榜。据悉，这些机构都存在非法处理公民遗传资源信息的行为。

2019年2月，中国某人工智能公司的数据库由于未做访问限制，直接开放在互联网上，导致超过

250万人的数据可被获取，这其中就包括了人脸识别图像。

小区强推人脸门禁归谁管

生物识别信息逐渐取代传统的数字密码，成为人们的“支付依据”“准入凭证”，可以说是价值非凡，因此常被人“惦记”。

趋利的不法分子通过一切手段，试图窃取“人体密码”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“猫鼠游戏”每天都在上演。

以人脸信息为例，如果想开发人脸识别技术，就需要大量的人脸信息训练相关模型。

讯飞AI研究院视频分析技术负责人吴子扬告诉记者，在商用的、来源正规的人脸信息数据库里，单人不同角度、不同场景的人脸数据集，能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。收集、倒卖公民人脸数据，正成为不法分子牟取利益的手段。

除此之外，人脸信息目前主要用于身份权限认证，一旦泄露，不法分子可以借此通过身份认证系统，盗取公民社交平台账号或金融账户内财产。

不少商家也把采集生物识别信息当作商业竞争中的取胜之匙。当消费者走进一个装有人脸识别设备的卖场，智能营销系统就会迅速识别出他是不是“熟客”，并分析其收入水平与消费习惯，商家可以借此进行精准推荐或“大数据杀熟”。

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使用场景愈发广泛，但是相关的应用还存在技术漏洞。

吴子扬表示，从技术层面来看，守护生物识别信息的难点主要在存储环节。存储器漏洞、缺乏访问控制机制、黑客攻击，都可能导致数据泄露。

与此同时，相关立法和监管机制还存在一定滞后。

浙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郭兵说，尽管我国有多部法律就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作出规定，但相关法条多为原则性规定，缺乏对生物识别信息具体、针对性规定。

“我国现有的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，难以满足日益具体、多样的规范需求。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学峰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适用于网络运营者，而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主体多种多样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即将生效，若受害者想凭此维权，需要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维权成本高，举证难度大。

周学峰表示，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，目前多个部门都有管辖权，比如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等部门。但多部门监管有可能导致监管职责不清。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集中统一主管部门，“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，公民在自身生物识别信息遭侵犯时，比如小

“萝卜白菜十三条”：探求社区治理“最优解”

浙江宁波“开放空间”民主协商议事观察

本报记者林光耀、顾小立

小区电梯怎么装，门禁怎么改，绿化带和停车位矛盾怎么解决……社区是基层自治的最小单元、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，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地。近年来，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引入了“开放空间”会议技术，尝试“议而决，决而行，行而果”，探求社区治理的“最优解”。

我的小区我做主

在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安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四层的议事厅里，一场“开放空间”的讨论热火朝天地进行着——

“我建议小区使用指纹门禁系统，方便又安全。”

“家里是指纹锁，小区如果采用指纹门禁，万一信息泄露太不安全。”

“人脸识别可以直接刷脸通过。”

“我看还是经典的门禁卡最好，老年人用起来没有负担。”

……

十几名居民围在一张方桌边，讨论小区应选用哪种门禁系统。一位居民充当记录员，记下小组讨论的结果。

房间里另两张方桌边，“门禁系统就位后小区如何管理”“小区内幼儿园来往人员如何使用门禁”等话题也被热烈讨论着。

安丰社区由玫瑰苑、三鼎坊和丰馨苑三个小区组成，住户3396户，总人口近1万。其中，玫瑰苑与三鼎坊两个小区是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。

“这次主题是‘聊聊老旧小区改造如何实现封闭式管理’。听到这个主题，你会想到什么？”在社

工主持人的引导下，40余位居民写下自己的关切。

按照“开放空间”议事程序，主持人选出了“热度”最高的三个话题，把它们贴到了黑板上，居民排队依次在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上签名，并分成3个小组展开讨论。他们将通过小组讨论、发布行动方案、正反方辩论、投票等各个环节达成共识。

“我们这个小组讨论的重点是门禁系统就位以后，小区应该如何管理。”作为第三小组的记录人，居民张蓓琳向全体参与讨论的居民汇报小组讨论成果：“我们认为应当采取负责人制度，每天安排专人值班，形成‘物业负责、居委会监督、居民遵守’的管理模式。”

自2013年在白云街道牡丹社区等社区试点以来，宁波市海曙区已在全区102个城乡社区推广了“开放空间”这一民主协商议事模式。

“开放空间”为何来

海曙区很早就遇到了城市基层治理难题。9个街道102个社区，有老小区，也有新小区，居民诉求纷繁复杂。这成了安丰社区党委书记陈赛花采用“开放空间”会议技术的原动力。

2013年4月，牡丹社区居民抛出要建“居家养老服务中心”的议题，社区“要地没地”“要人没人”，时任社区党委书记的陈赛花想破头也想不出解决办法。

这时，还作为新鲜事物的“开放空间”走进她的视线。当时，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，到宁波分享社区治理经验，一本“开放空间”操作手册，传到了陈赛花的手中。

作为一种会议技术，“开放空间”由美国学者哈里森·欧文设计提出。他发现人们在开会时很沉闷，茶歇时间却交谈甚欢、交流颇有成效，受此

启发，他设计出了“开放空间”的会议技术。

“开放空间”遵循四大原则：在场的人就是合适的人，凡是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，只要开始了时机就到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而最重要法则则是“双脚法则”——可以用自己的双脚自由移动，随时选择自己喜欢的话题。每个参与者既可以做辛勤贡献意见的“蜜蜂”，也可以做自由来往静静旁观的“蝴蝶”。
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她邀请了社区党员代表、义工代表、社区工作者以及愿意参加讨论的普通居民尝试一次“开放空间”讨论。结果出乎意料，社区居民带来了需求、问题，也提供了解决建议。

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要设在底层，方便老年人走动；服务中心最好能设个茶室，老年人能喝茶聊天；有人想报名成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志愿者……社区居民的“金点子”提了30多条，足足写满了3张纸。

最终，在“开放空间”的努力下，社区找到了场地、确定了设施，并且还对接到了服务中心成立后服务的志愿者团队。

“萝卜白菜十三条”

在传统的社区中，居委会往往是帮居民拿主意的一方，如家长一般为居民包办大小事务。面对纷繁复杂的诉求、重叠交织的利益，居委会常常居中协调，但又往往得不到理解、吃力不讨好，而社区居民没参与感、不满意、不开心，“双输”的局面成为社区治理困局。

安丰社区居民张志成说，“开放空间”的出现，缓解了紧张关系，让社区问题得到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。

“开放空间”有着自己的“规矩”。现场任何人

讲话、发言，必须遵循“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面对面对话”“不得进行人身攻击”“不得打断其他人陈述”等一系列规则。7年多来，随着“开放空间”持续开展，这些规则逐渐深入人心，社区居民将之称之为“萝卜白菜十三条”。

在玫瑰苑小区围墙改造议题上，围墙边楼栋的居民对设计单位给出的围墙高度均不认可，低楼层居民觉得加高太压抑，高楼层居民则担心围墙太过低矮不安全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陈赛花把“开放空间”开到了围墙边。最后居民们一致决定，推翻设计单位给出的“标准解”，改为给围墙加上三块砖的高度，并架设高50厘米的防盗网。

居民们在开放空间中讨论、让步、做决定，最后得出民意的大公约数，这成为众人眼中社区治理的“最优解”。据了解，7年多来，“开放空间”议事8500余次，有效解决或回应近8000条，议事居民超10万人次，参与其中的居民满意度达到95%。

“议而决，决而行，行而果。”宁波市海曙区民政局副局长吴鹤立认为，这就是“开放空间”相较于其他社区治理模式最大的不同，也是突破所在。

为基层民主实践加载制度框架

作为一个从国外引入的会议技术，“开放空间”如何适应中国的社会人文环境、又该走向何方？

针对老旧小区中老年人较多、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较为拘束、会议前期容易出现发言不踊跃、参与度不够等情况，热身环节被引入了“开放空间”中。拍手歌、手指操、“破冰”小游戏，既

活跃了气氛，也让居民放下了拘束和戒备。

对于较为复杂、解决难度较大的议题，则通过缩短议程、多次召开的形式，让每次“开放空间”聚焦具体话题、落到实处。

解决问题还需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。吴鹤立说，发动依靠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成为“开放空间”的中国特色。

事前，社区发动党员收集议题，并邀请利益相关的、感兴趣的居民参与，让讨论能在一个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方向上开展，此为“舵手”；

事中，党员干部带头发言，积极参与讨论，鼓励其他居民就讨论话题提出问题、发表看法、给出解法，此为“鼓手”；

“推手”则意味着社区干部身份的转变，从“社工台上坐、居民台下听”转变为居民主导，社工协助居民完成讨论，社区干部则成为了话题的引导者、讨论的组织者、规则的守护者。

陈赛花介绍，在玫瑰苑小区围墙改造的墙边“开放空间”中，社区承担了讨论的组织、秩序的维持和与施工方对接的工作，但最重要的讨论环节、互相的妥协、最终的决策，都是居民们在“开放空间”中达成的。

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夏学民看来，“开放空间”一方面提高了居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意识、规则意识，另一方面有效减轻基层政府及其政府派出机构的工作量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社区居民对社区问题解决的参与率和满意度。

“可以考虑用技术标准的形式来规范它，从而给基层民主实践加载制度的框架。”夏学民说。

编辑李坤晟